

论魏晋经学与文学复古之风

刘运好 程平*

〔摘要〕 经学尤其《诗经》仍然是支撑魏晋文学的主流意识之一。在诗歌体式上,魏晋文学大量摹拟《诗经》,以四言为主;在诗歌题材和主旨上,直接摹拟《诗经》,创造出拟经诗、补亡诗、拟《诗》诗三种类型,复古之风达到了空前炽烈的局面;在艺术风格上,以雅颂为主、又以风入雅,从而对如何继承《诗经》的文学传统提供一次集大成式的探索,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。

〔关键词〕 魏晋;经学;文学;复古

魏晋时期,作为一种学术文化,经学始终处于主流地位;作为一种思想文化,儒学始终是维系社会运转的思想支点。因此,以《诗经》为代表的儒家经学必然成为影响文学的重要因素。这种影响,既缘生于经学走下了神坛,恢复了文学的本来面貌;又缘生于经学作为一种经典难以逾越的文学地位,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。因此,汉末动乱之后,一方面是礼崩乐坏,经学与儒学失去了唯我独尊的局面;另一方面文学的复古之风始终在潜滋暗长,至西晋发展到了顶峰。在创作上,以《诗经》为摹拟对象,以雅颂为审美标准,魏晋的诗歌体式、题材主旨、艺术风格,无不受《诗经》影响。

一、文学复古之风背后的经学影响

文学复古之风,盛行于西晋前期。然而考镜源流,却又始于建安。建安是一个“文学自觉”时代的开始,然而建安文学并没有割断文学传统;西晋中期以后在“缘情”遮蔽下仍然呈现出浓厚的文学复古倾向;惟有东晋玄释之风大炽,诗骚传统开始坠落。而经学(儒学)则是隐蔽于文学复古之风的背后推手。

建安诗歌,曹操尚存“汉音”,曹丕始成“魏响”,曹植集其大成。虽然或古直悲凉,或便娟婉约,或辞赡骨奇,风格各异,但是有一个基本点是:在“文学自觉”中依然积淀深厚的文学传统,与《古诗十九首》相比较,恰恰表现出在一定程度上的传统复归。

* 刘运好,文学博士,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,古代文学博士生导师;程平,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博士生,241000。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魏晋经学与诗学关系研究”(08BZW032)中期成果。

无论在历史还是文学史上,曹操都是一个被误读较深的人物。研究者也往往列举《求贤令》等以证明曹操弃道德而重才能,与儒学传统似乎格格不入。其实,以法治军,以儒治国,是曹操的基本执政方略。《拜高柔为理曹掾令》所说的“夫治定之化,以礼为首;拨乱之政,以刑为先”,可以视为其基本执政理念。可见曹操重法术,实在是动乱时世中不得已的战时措施。一旦局势相对平静,就下令建学校,置学官,恢复儒学教育。而且曹操所树立的人格典型如卢植、崔琰、杜畿等,也都是以儒家为标准。其四言诗《对酒》所向往的吏不呼门、王者贤明、民无争讼的太平盛世,就是以儒家思想为底色;《短歌行》所推崇的周公、齐桓,也是“孔子所叹”的历史人物。其诗歌体式以四言影响最大,少数作品以《诗经》成句入诗,表现出深厚的汉代诗学传统。

曹丕虽无乃父的雄才大略,然其恪守经学传统则又过之。不仅自己“余所以少诵《诗》论,及长而备历五经、四部”(《典论·自序》),而且“妙思六经,逍遥百氏”(《与吴质书》),也是以曹丕为领袖的邺下文人集团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。阅读研究的对象虽极为广泛,经学却是其中的重要内容。丕禅汉建魏以后,下《追崇孔子诏》,又定正朔,轻刑法,薄赋敛,并且辑纂类书,所推行的即是以儒治国的基本方略。其后,明帝诏令恢复经学,裁抑浮华,选人以德,敦崇郎吏学通一经,正是沿着文帝的路线发展而来。曹丕诗学,亦以儒家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为基本标杆。其诗虽有浓厚的文人化气息,沈德潜曰:“子桓诗有文士气,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。”^①写爱情,写悲情,浸透着浓郁的生命迁逝的感伤,便娟婉约,悲而不壮,表现出建安诗歌发展的转向,但是曹丕诗歌也并未割断儒学传统,如《秋胡行》追思上古盛世,强调得人任贤,顺应天道,是传统的儒家思想。《艳歌何尝行》“约身奉事君,礼节不可亏”等说教式的语言,更是儒家思想的直接反映。

曹植生活,早期与曹丕近似,但在太子之争中逐渐趋于下风后,反而表现出比曹丕更加强烈的建功立业的理想。《与杨德祖书》“戮力上国,流惠下民,建永世之业,流金石之功”,是其理想的直接表白。而《白马篇》所塑造的奔赴国难、立功疆场的游侠形象,也正是诗人的自我写照。即使在晚年也仍然充满“功铭著于景钟,名称垂于竹帛”(《求自试表》)的政治幻想。儒家的立德、立功、立言的人生价值观,是曹植一生主要的思想支点,只是在残酷的现实掐灭了政治幻想之后,诗人才转入写弃妇之怨、游仙之境。由上可见,以曹氏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仍然是以儒学为根底。

西晋初期,晋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倡导读经,敦崇儒学。荀崧《上元帝疏》企图重建正始以来业已分崩离析的儒学一统的局面,恢复以儒学伦理关系为构架的社会伦理秩序,重建以儒教文化为核心的礼乐文化,以恢复中央专制集权下的社会向心力。在这种风气影响下,文学复古蔚成风气。以傅玄、傅咸、张华等为代表的一批儒生兼文学家,成为开西晋复古之风的人物。傅玄是一位正统的儒学派文人,多次上书指斥时弊,倡导复兴儒学,其《上疏陈要务》曰:“夫儒学者,王教之首也。尊其道,贵其业,重其选,犹恐化之不崇,忽而不以为念,臣惧日有陵迟而不觉也。”其文学观念推崇“诗之《雅》《颂》,书之《典》《谟》”,其乐府诗如《秋胡行》,敷衍汉代故事,追踪古诗主题,表现出明显的模拟与复古倾向;“彼夫既不淑,此妇亦太刚”,则纯粹是儒家说教的口吻。从内容到形式,傅玄都是一个典型的复古主义者。傅咸一如其父,思想上服膺儒学,文学上以诗歌的形式阐释经学内容,创作了成就不高而名声鹊起的《六经诗》,表现出更为浓厚的尊经复古的色彩。三人中,张华文学成就最高。其诗或抒发久历宦海的复杂情感,如《答何劭诗》三首;或表现儿女之情,如《情诗》五首。然而,其乐府诗袭用旧题,规步前人,其应诏诗、饮宴诗满纸谀颂,意旨

^①沈德潜:《古诗源》卷五,北京:中华书局,2006年,第93页。

多取自经学。如《励志诗》虽有敷衍玄理的内容,思想比较驳杂,却以“勉志以修德业”^①为内容主体,也有深刻的经学烙印。如其九曰:“复礼终朝,天下归仁。若金受砺,若泥在钧。进德修业,晖光日新。隰朋仰慕,予亦何人。”通篇言志,重申儒家思想,表现出典型的儒者风范。

西晋中期,文学复古风气尤浓。在诗学思想上,左思的“贵依其本”、“宜本其实”(《三都赋序》),挚虞的“雅音之韵,四言为正”^②等理论,都表现出强烈的复古倾向。陆机“诗缘情而绮靡”(《文赋》),虽浸透着深厚的“文学自觉”意识,但同时宣称文学“明道述志”(《遂志赋》)的教化功能,其底色究竟没有脱去儒家诗教的思想。如果说挚虞《文章流别论》是文学理论上复古之风的代表,那么陆机的一系列规步前人的拟古诗,则是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上复古之风的代表。其拟古诗可以分为两类:第一类是摹拟《古诗》12首。明费经虞评曰:“虽曰建安以来人号古,然曹氏父子之拟古,亦只是同题耳。选词命意,乃各出机轴,尚与后代规矩步趋者有别。陆机《拟十九首》,则全拟古之体矣。”^③清吴兆宜又曰:“拟古自士衡始。句仿字效,如临帖然。”^④其实,前人评价并不确切,拟古并非始于陆机,而且其拟古也不是“如临帖然”,笔者曾概括说:“每首内容与所摹拟之原诗,基本构成一种对应关系。然其非止规模成构,因袭词章。所拟之意固是《十九首》闺妇思远,游之怀乡,亦浸透着诗人浓浓乡情,以及对故乡风情之悬想。少数篇章或自明其志,或直抒心曲,折射了诗人心境与情怀。艺术上,或造语,或造境,亦有可圈可点之处。”^⑤另一类是乐府诗38首。陆机乐府诗是以古乐府的题旨作为发端,抒情言志。既与建安时期以旧题写时事不同,又与自拟诗题的乐府也不同。如《猛虎行》,张铤注:“《古猛虎行》云:饥不从猛虎食,但取发首为名,不必以

篇中意义,他皆类此。观其大体,是劝人抗其志节,义不苟容。”^⑥通过与古乐府比较,就清晰地揭示了陆机乐府的抒情特点。同时的左思以咏史写情志,开创了《咏史诗》的新局面,但《三都赋》恪守“赋者,古诗之流也”的儒家文学观念,强调“贵本宜实”,也表现出浓郁的文学复古倾向。只是到了西晋后期,刘琨《扶风歌》写壮心报国、慷慨悲凉的情怀;卢谌《览古诗》以蔺相如之故事,表达立功报国的热切愿望,诗风为之一变,才成为西晋诗坛别样的夕阳风景。

东晋时期,诗人儒家的情怀多消解在玄释之中,文学走出了复古之风,而呈现出一派新的气象。然而多以四言诗阐释玄理,因为“淡乎寡味”而颇受后人诟病。

综上所述,除东晋外,经学思想始终是支撑魏晋文学的主流意识。只是在“文以气为主”和“诗缘情”理论的遮蔽下,人们很容易忽略文学深层中的经学思想影响,明清诗学对陆机“缘情”说的指责恰恰提供了一个反证。

二、四言诗歌体式: 对《诗经》形式的摹拟

魏晋文学的复古之风,还表现在继承汉乐府和《古诗十九首》的同时,又大量摹拟《诗经》、以四言为主的诗歌体式上。四言诗之发达,与魏晋复古的诗学观念密切相关。建安时期,虽重“通脱”,骨子里并没有割断传统,四言诗的发达即是明证。至西晋,挚虞《文章流别论》明确指出:“雅音之韵,四言为正,其余虽备曲折之体,而非音之正也。”“四言为正”的观点,实际上是西晋诗人的普遍观念。直至后来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仍然强调:“四言正体,则雅润为本。五言流调,则清丽居宗。”所谓“正体”实际上就

①六臣注:《文选》卷十九,杭州:浙江古籍出版社,1999年,第342页。

②严可均:《全晋文》卷七十七,北京:中华书局,1958年,第1905页。

③费经虞:《雅伦》卷九,《全明诗话》(六),济南:齐鲁书社,2005年,第4659页。

④吴兆宜:《玉台新咏笺注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5年,第95页。

⑤刘运好:《陆士衡文集校注》,南京:凤凰出版社,2007年,第436页。

⑥六臣注:《文选》卷二十八,第499页。

是指《诗经》的文学体式,故魏晋时期五言固已腾踊,四言亦未衰微。

建安时期,“虽然出现曹操、曹丕等人的乐府四言诗,似乎脱离了《诗经》以来,以雅颂为主调之诗教传统,但是,建安的雅颂风格四言诗,仍旧保持其正统地位。”^①这一时期共有四言诗63首(23首残句),可以分为两类:第一类乐府四言诗。这类诗主要或藉乐府旧题叙事抒怀,除形式上保留了四言体式外,其诗歌境界亦“于三百篇外,自开奇响”^②。如曹操《短歌行》、曹丕《丹霞蔽日行》,或抒写壮阔胸襟,或感慨岁月流逝,表现出与《诗经》不同的文学审美祈向。但是这一时期的乐府四言,除了大量引用《诗经》成句入诗,如曹操《短歌行》、曹丕《善哉行》等外,在思想上也与儒家经学相当切近,如曹操《善哉行》所歌颂的贤哲都是儒家推崇的历史人物,其风格也脱去了其他乐府古直悲凉的风格,而向雅颂的温润典雅回归。可见曹操也并非完全“通脱”,诗歌也并未全然脱离儒家诗教的传统。此外,曹叡存诗14首,均为乐府,其中四言五首,儒家诗教色彩更为浓厚。第二类自拟四言诗。这类诗有少数篇章后来播之管弦,成为乐府诗的一部分,如曹植描绘游仙的《飞龙篇》,《乐府诗集》收入《杂曲歌辞》中。然而,大部分诗歌乃是赠答、游宴、抒情言志的案头文学,后人亦统称之古诗。这一部分诗歌儒教色彩尤为深厚,如曹丕《黎阳作》,歌颂周武王及其弟公旦的“救民涂炭”的伟业,表达自己靖乱安民的伟大抱负,其内涵与儒家诗教传统并无二致。而曹植《责躬诗》不仅内容恪守儒家诗教,其句式体格也与雅颂近似。

正始时期,玄风勃兴,四言诗亦发生了分化。或厚重犹如雅颂,阮籍四言《咏怀诗》13首,虽间有玄理或隐逸之思,其主导思想则是儒家,如其四:“谁能秉志,如玉如金。处哀不伤,在乐不淫。恭承明训,以慰我心。”秉承儒家之志,诗

风温柔敦厚,全是儒家诗教的口吻。或轻逸犹如《国风》,嵇康《赠兄秀才入军诗》,思想虽是“越名任心”,有深厚的老庄思想的烙印,体式风格却又见《国风》的影响,如其三、其四颇受《卷耳》、《谷风》、《燕燕》的影响。这种诗风经过陆云、郑胄等发展,而下开东晋四言诗风。

在复古之风弥漫的情况下,西晋四言创作极为发达,竟达三百余首,数量上大大超过了五言。对后代影响也以四言为重,仅以王夫之《古诗评选》为例,所辑录的四言诗,汉代4首,魏代32首,西晋48首,于此可见一斑。其内容以歌功颂德为主,主要用于赠答、应诏、公宴、祖饯等庄重场合。其中四言赠答成就最为突出,仅《文选》就辑录74首。西晋之前的四言赠答诗,“突破原先因写赠答对象不同而连带使诗作内容界域分明、僵化凝滞的境况,进而开展出无物不可写、无情不可抒、无事不可述的新体貌。”^③嵇康《赠兄秀才入军诗》可为代表。崔宇锡指出:“但是,大部分的西晋四言赠答诗,以典丽之语言颂美对方的人格、文才、事功。其间亦有以‘玄理’规诫对方之词,显然继承了诗教‘美刺’传统,导致抒情成分显著地褪色。”^④其实,善作谀颂是西晋应制、赠答的一大特点,如应贞《晋武帝华林园集诗》之谀晋君,陆机《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赋诗》之谀太子,潘岳《为贾谧作赠陆机》之谀士衡,潘尼《答傅咸诗》之谀友人。然而,其中“二陆”谀颂诗有两点例外:一是在美颂、规诫中浸透亡国之痛的复杂情感,如陆机《与弟清河云》,“诗追溯家世,赞美二兄才德与功勋,表达自己不能继承先人遗业,使晋军灭吴,功业烟灭惭愧……以及归至家中物是人亡之痛楚”。二是在美颂、规诫中表达浓郁的超然尘世的隐逸之思。如陆云《答孙显世》,“赞美显世既有超然归隐之志……抒写弃官归隐,逍遥守志之怀思……归隐丘园之思,是此诗的主旋律。”^⑤其应

①【韩】崔宇锡:《魏晋四言诗研究》,成都:巴蜀书社,2006年,第73页。

②沈德潜:《古诗源》卷五,第91页。

③梅家岭:《汉魏六朝文学新论·拟代与赠答篇》,台北:里仁书局,1997年,第227页。

④【韩】崔宇锡:《魏晋四言诗研究》,第156页。

⑤刘运好:《陆士龙文集校注》,第1134、555页。

诏、公宴诗,也基本以颂美为主体,甚至连“谏诤”的尾巴都被截去了。唯有祖饯类诗的结尾,常常拖着依依别情的尾巴,尚见一丝真情。

东晋以降,以诗言理,或谈玄,或言佛,或写仙道,儒家情怀消解在玄释的说理中,经学的影响已经难觅踪影。惟有陶渊明四言诗,或摹拟风诗的形式,或阐释儒家的思想,以清丽生新的语言,创造超脱明净的诗境。如《荣木》诗前二首以“采采荣木,结根于兹”、“采采荣木,于兹结根”发端比喻,在形式上与《卷耳》形似;后二首或表达“徂年既流,业不增旧”的追悔,或抒发“先师遗训,余岂云坠”的自励,在内容上与儒学神通,由此尚可见《诗经》的遗绪。

从四言诗嬗变轨迹上看,建安在通脱中浸透着儒教传统,正始在超越中守望着儒教传统,西晋在复古中试图全面恢复儒教传统,东晋则在玄释中消解了儒教传统,惟有陶渊明尚表现出儒教传统的最后一丝回光。

三、拟经诗、补亡诗、拟《诗》诗： 经学的直接影响

魏晋文学的复古之风,还表现在直接摹拟《诗经》,以儒家经学为诗歌题材、主旨上。这一部分诗歌可以分为拟经诗、补亡诗、拟《诗》诗三种类型。

第一,拟经诗,即以儒家经典的内容为诗歌的题材主旨,傅咸《七经诗》是其典型。《诗纪》云:“《春秋正义》曰:傅咸七经诗,王羲之写,今所存者六经耳。”^①所存之《毛诗诗》、《周易诗》、《论语诗》、《孝经诗》、《周官诗》、《左传诗》六首,内容完全是抽象的儒家经学的内容,语言也几乎全部取自儒家经典。如《论语诗》二章皆取《论语》成句组织成篇。这类诗以儒教为核心,类似于押韵的箴言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,诗人截取《论语》之句颇有匠心,将需要表达的意义重心留于言外,使读者通过联系经典而得其主

旨。如说“克己复礼”,意在于“仁”;说“学优则仕”,意在于“仕优则学”;说“为仁由己”,意在于“由人乎哉”,强调修身的重要;说“以道事君”,意在于“勿欺之而犯之”事君之道;说“死而后已”,又意在于“任重而道远”的君子之道。由此可知,强调养仁、好学、修身,事君以道而不谄佞,刚毅弘正而不退缩,是此诗表达的基本主旨。虽取自《论语》成句,也委婉地表达了诗人的价值取向。又如《毛诗诗》第一章,首二句取自《小雅·无将大车》;次二句取自《大雅·文王》;“显允君子”,取自《小雅·湛露》;“大猷是经”取自佚《诗》,《尚书考异》卷一引作《小雅·匪》。此诗亦可视为中国集句诗的始作俑者。然而,虽为《诗经》集句,句意也多取毛传、郑笺,意义却浑融一体。其诗意是:若举荐小人,则蔽己伤德。惟有威仪之士,方能安宁君主;明信君子,方能以大道经国体野。考其史实,此诗当别有寄托。傅咸曾任御史中丞,其职责是纠察百官,“职轻事重”,故“清论褒贬之任,作诗以见规”(《答潘尼诗序》)。可见此诗其实就是其人才观念的表白。以阐释经学的内容,表达举荐人才的重要。既是“谏诤”,亦为自警。诗的艺术固不足道,思想却精警深刻。

第二,补亡诗,即补作《小雅·笙诗》六首有目无辞之作,试图还原《诗经》佚诗的原貌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曰:“考郑玄之释《南陔》曰,子夏序诗篇义各编,遭战国至秦而《南陔》六诗亡,毛公作传,各引其序,冠之篇首,故诗虽亡而义犹在也。”^②晋有《补亡诗》数家,惟束皙诗保存完整,影响最大。其《补亡诗》序曰:“皙与同业畴人,肆修乡饮之礼,然所咏之诗,或有义无辞,音乐取节,阙而不备。于是遥想既往,存思在昔,补著其文,以缀旧制。”这一组诗完全摹拟《诗经》,其口吻或讽谏劝诫,如《南陔》、《白华》;或颂美王化,如《华黍》、《由庚》、《崇丘》、《由仪》。基本上依据现存的“诗小序”以确立主旨,布局成篇。《毛诗序》曰:“《南陔》,孝子相戒

^①逯钦立: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3年,第603页。

^②纪昀等: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十五《诗序》,海口:海南出版社,1999年,第87页。

以养也。”此诗主旨正是围绕诗序展开。以沿南陇采兰起兴,然后抒写眷念父母,心不安宁,告诫居家之子,不可盘游无度,须柔心色养,馨洁其食,朝夕供贍,不可或缺;既如水獭捕鱼,乌鸦反哺,又切忌如鸟兽之厚养薄敬,既须厚养,又须态度虔诚,以光大父母的福祉。诗之主旨秉承诗序,劝勉奉养高堂;其句式摹拟《诗经》,以比兴发端,引入题旨;其风格亦如雅诗,音调和谐,语言雅洁,格调既柔且刚。既似其形,亦得其神,若放入《诗经》之中,几可乱真。《文选》作为选诗之首,绝非偶然。夏侯湛另有《周诗》,亦属补亡诗之类,可惜今止存一首,余皆散佚。

第三,拟《诗》诗,即题材主旨以《诗经》为主,亦间有取自其他经学,其中陆云成就最高。其拟《诗》诗有两种不同情况:一是从题旨到形式完全摹拟《诗经》。如《赠顾骠骑》第二首《思文》序曰:“《思文》,美祁阳也。祁阳能明其德,刑于寡妻,以至于家邦。无思不服,亦赖贤妃贞女以成其内教,故作是诗焉。”题取《周颂·思文》:“思文后稷,克配彼天。”意取《大雅·思齐》:“刑于寡妻,至于兄弟,以御于家邦。”及《文王有声》:“自南自北,无思不服。”杂取诸《诗》,以形成新的诗歌主题。二是题旨形式以摹拟《诗经》为主,兼取其他诸经。如《赠郑曼季》,题旨杂取其他经书,与拟经诗近似。然而拟经诗取经书成句,集句成诗。此诗惟取儒家经典语句为题,题旨兼取其他诸经,而自创诗境。如第三首《南衡》序曰:“《南衡》,美君子也。言君子遁世不闷,以德存身。作者思其以德来仕,又愿言就之宿。感《白驹》之义,而作是诗焉。”诗题取《大雅·崧高》,《诗》序曰:“《崧高》,尹吉甫美宣王也。”又毛传曰:“崧,高貌。……岳,四岳也。东岳岱,南岳衡,西岳华,北岳恒。”诗意又取《易·大过》:“君子以独立不惧,遁世无闷。”又取《小雅·白驹》序:“《白驹》,大夫刺宣王也。”郑玄笺:“刺其不能留贤也。”此外,郑曼季《答陆士龙诗》亦如陆云赠诗,题材主旨亦以《诗经》为主,兼取其他诸经。通过以上内容的排

列,可以看出,这一类诗歌的标题、主旨、形式主要摹拟《诗经》,具体内容又兼取其他诸经。

拟经诗、补亡诗、拟《诗》诗的出现,从内容到形式都使文学创作的复古之风达到了空前热烈的局面。然而,拟经诗开创了中国集句诗的新的诗歌体式,补亡诗探索了历史语境的还原问题,拟《诗》诗提供了摹拟中别造诗境的创作经验。这些方面为后来的诗歌发展提供了有意义的镜鉴。

四、雅颂为主、以风入雅的艺术风格

魏晋文学的复古之风,也表现在四言诗以雅颂为主、又以风入雅的艺术风格上。从而对如何继承《诗经》的文学传统提供一次集大成式的探索。

自从《诗》被尊为“经”后,雅颂就成为后人创作争相摹拟的对象。《诗》之雅颂与风诗微有不同。在语言风格上,雅颂多是整饬的四言,而风则有较多的杂言;风诗(包括部分小雅)多重章叠句,且多用语气词调整音节或用来煞尾,而雅颂则很少这种语言现象。在表现风格上,风诗“优柔委曲,意在言外”,雅诗“明白正大,直言其事”,而且《小雅》多“寄兴之辞”,兼有风体;《大雅》“辞旨正大,气象开阔”;颂诗“美盛德之形容”。因此而形成了雅颂庄重典雅、雍容整饬的审美风格。汉代四言诗所存不多,但是像韦孟《讽谏诗》、《在邹诗》、傅毅《迪志诗》等,也都具有雅颂的特点。王夫之评《讽谏诗》曰:“撰篇六度,居然在《韩奕》、《崧高》之上,弘整故也。”^①

魏晋时期,四言诗与五言诗分庭抗礼,然而“雅音之韵,四言为正”的诗学观念深入人心,不仅郊庙祭祀、宴飨礼乐采用四言诗,其他庄重的场合或者表达恭谨严肃的情感也都采用四言诗。而五言诗则用来自由地抒发情感,这与后代的“诗庄词媚”创作观念颇有些类似,因此魏

^①王夫之:《古诗评选》卷二,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1997年,第78页。

晋诗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以雅颂作为难以企及的审美标准。不惟曹操《善哉行》有典型的雅颂之风,即使是便娟婉约、颇有文士气的曹丕,其《黎阳作》二首也充满了典雅雍容的雅诗格调。如其二写行役之艰难,却又是取《小雅·出车》的诗意。曹植诗以“骨气奇高,辞采华茂”而著称,然其《应诏》、《责躬》、《矫志》、《朔风》等诗则语言平整、风格雍容而略显板滞。建安七子中,以王粲四言诗成就最高,挚虞评之曰:“王粲所与蔡子笃及文叔良、士孙文始、杨德祖诗,及所为潘文则作思亲诗,其文当而整,皆近于《雅》矣。”^①可见亦有《诗经》雅颂影响的痕迹。

如果说建安四言诗以雅为主要风格,那么西晋四言诗则以颂为主要风格,又兼取雅诗。其中傅玄是开西晋雅颂之风气的人物。傅玄存古诗四言4首,乐府诗24首。其四言乐府除了拟曹操《短歌行》等5首外,其余均属宗庙乐府,虽其艺术价值不如其五言乐府,然其诗歌史意义则不可忽视。《晋书·音乐志上》曰:“泰始二年,诏郊祀明堂礼乐,权用魏仪,遵周室,肇称殷礼之义,但改乐章而已。使傅玄为之词云。”所制的郊庙歌辞18首,其中15首是四言体。郊庙歌辞是典型的歌功颂德的作品。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卷一曰:“《周颂·昊天有成命》,郊祀天地之乐歌也;《清庙》,祀太庙之乐歌也;《我将》,祀明堂之乐歌也。《载芣》《良耜》,藉田社稷之乐歌也。然则祭乐之有歌,其来尚矣。两汉已后,世有制作。其所以用于郊庙朝廷,以接人神之欢者,其金石之响,歌舞之容,亦各因其功业治乱之所起,而本其风俗之所由。”其中汉唐山夫人《安世房中歌》17首,歌后妃之德,全为四言,对傅玄产生了直接影响。郊庙歌辞是儒家礼乐文化在中央专制集权下的产物,美盛德,颂神明,是其基本功能。此外,西晋赠答、应制之诗,几乎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,追溯辉煌家世,赞美才德业绩,谀颂之词满纸,将本为赞美先祖盛德的祭祀之诗,移入赞美现实人物之中,往往难以卒读。

然而,以风入雅,也就是说将灵动的句式,“优柔委曲,意在言外”的表达手法,引入雅颂的创作之中,使魏晋这类诗歌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。王夫之《古诗评选》卷二评曹丕《黎阳作》曰:“只用毛诗‘雨雪载涂’一句纵横成文,伤悲之心,慰劳之旨,皆寄文句之外,一以音响写之。”以赋的手法,平静地描述,使情余言外;以经典的四言二节拍的句式,又大量使用语气助词,构成整饬雅洁且又鲜活灵动的风格。曹植《朔风》在摹拟中亦有灵动,如其二“昔我初迁,朱华未晞,今我旋止,素雪云飞”,诗意句式全取《小雅·出车》“昔我往矣,黍稷方华。今我来思,雨雪载途”。但以“素”状雪的色泽质感,以“飞”描摹雪的飘动之感,带有状物灵动的艺术美感。正始时期,诗人将“轻澹”之体带入四言诗中,反而使之诗境明净,神韵独至,自成高格,嵇康是其典型。《古诗评选》卷二评其《杂诗》曰:“四言有《三百篇》在前,非相沿袭则受彼压抑。乃如此篇章绝不从南、雅、风、颂求步趋,而清光如月,又岂日之所能抑哉?”其《赠兄秀才入军诗》“鸳鸯于飞,肃肃其羽”;“鸳鸯于飞,啸侣命俦”,“二章往复养势,虽体似风雅,而神韵自别”。取《诗经》成句,描摹物象,然而又带有屈辞的高洁情怀,玄学的超然境界,化兴为比,诗人自我形象也鲜活灵动的投映在诗境之中。

嵇康的这种以风入雅、别造诗境的审美风格,深刻影响了西晋部分诗人的四言诗创作,以陆云为甚。陆云虽善作谀颂之词,代表了西晋雅颂诗的基本模式,但其大多数四言诗善于抒情。或在写游子思妇之愁中,融入“堂构既崩,过庭莫睹”的覆国亡家之痛;或在写亲友离别之情中,融入“变彼同栖,悲尔异林”的身世悲怆。善于运用简约、雅洁的语言,创造出晶莹剔透而富有质感的意象,是其四言诗造境的基本特点。如以“蓬户惟清,玩物一室”写其室;“清晖在天,孰与永日”(《失题八章》),写其光;“仿佛佳人,清颜如玉”,写其人;“和神当春,清节为秋”(《失题六章》),写其时,等等。特别是《赠郑曼季往

^①严可均:《全晋文》卷七十七,第1905页。

返八首》,“流莹鼓物,清尘拂林”,写景状物,布采鲜净;“德耀有穆,如瑶如琼”,设譬取象,晶莹玲珑,尤其富有鲜明的质感。这类诗歌,轻绮而不繁缛,以之言理,理不枯淡;用来抒情,神清气爽。且意象晶莹剔透而质感鲜明,从而构成蓝田日暖、良玉生烟式的空灵的诗歌意境。善于以风入雅,使其诗典雅庄重而不失灵动活泼,是其四言诗造境的另一特点。其应制诗,善作冒头,实际上是直接继承雅颂“史诗”的叙事与抒情方法,然又无其平板涩滞之弊。如《公将还京邑祖饯赠此诗》,后四章打破时空界限,将现实的时空与想象的时空交织,忽此忽彼,腾挪起伏,其结构别具一格。这种时空处理的方式显然又取《秦风·蒹葭》而加以拓展创新。其《赠郑曼季》、《赠顾骠骑》直接摹拟《诗经》。前诗《谷风》篇,诗题取《小雅·谷风》,每章皆以“习习谷风”起兴,然诗意取《大雅·烝桑》。诗歌写景,又取《王风·君子于役》手法,将眼前之景与虚拟之景交错并陈,结构在虚实中显出变化,诗境在推宕中亦显空灵。后诗《思文》赞美祁阳俊德,内教谨严,由齐家而治天下,诗题拟《周颂·思文》“后稷配天”之意,而结构却与《大雅》之《文王》、《大明》相似。《古诗评选》卷二曰:“西

晋文人,四言繁有。……入隐拾秀,神腴而韵远者,清河而已。既不貌取列风,亦不偏资二雅。以风入雅,雅乃不疲;以雅得风,风亦不佻;字里之合有方,而言外之思尤远。故欲求绍续于删余,惟斯为庶几焉。”其拟《诗》,杂取雅颂之典雅,运以风诗之灵动,又汲取《楚辞》、《古诗》的抒情方式,故其诗歌的言、象简约而清莹,典重之中透出活泼灵动。这种高超的诗歌艺术,使之成为西晋四言诗的典范。陆云诗的审美特质,与兄陆机有别,在西晋诗风中也独树一帜,直接影响了东晋兰亭诗风的形成。以雅颂为主体,又以风入雅,实际上是对如何继承《诗经》的文学传统提供一次集大成式的探索。

魏晋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承上启下,“承上”的意义在于:由摹拟而走向扬弃,表现出文学发展过程中传统与革新并存的二元关系;“启下”的意义在于:既为后人提供了文学发展的成功经验,也提供了应该汲取的失败教训。所以,后代文学以复古为革新时,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魏晋文学复古之风的成功与失败为镜鉴。

(责任编辑:陆林)

Classical Scholarship in Wei-Jin Period and Restoration of Ancient Literary Tradition

LIU Yun-hao, CHENG Ping

Abstract: Confucian classics, especially the *Book of Songs*, were one of the leading forces shaping the literature of the Wei-Jin Period. In terms of the poetic style, Wei-Jin literature mimicked the *Book of Songs*, with *siyan* poems (the poems with each line composed of four Chinese characters) as its major pattern. In terms of the subject matter and theme, Wei-Jin literature directly mimicked the *Book of Songs*, and created three types of poems: the poems depicting Confucian Classics; the poems supplementing the missing part of the *Book of Songs*; the poems parodying the *Book of Songs*. The fervor of restoring ancient literary tradition reached its peak in that period. In terms of the artistic style, Wei-Jin literature gave priority to *ya* (odes) and *song* (hymns), and transformed *feng* into *ya*, making a bold exploration of how to inherit the literary tradition of the *Book of Songs*. Wei-Jin literature forms a key link in the long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.

Key words: Wei and Jin Dynasties; Confucian Classics; literature; restoration of ancient tradition